
定風波——鄭傳雙先生訪問紀錄 (附：王國芝女士訪問紀錄)

訪問：鄭志高*

記錄：鄭志高

時間：2021年3月21日、4月3日、4月11日、4月17日、5月5日

地點：廣東省珠海市中山大學珠海校區榕園九號樓（鄭志高）、安徽省六安市舒城縣城關鎮家中（鄭傳雙、王國芝）。

訪談形式：兩地以微信視頻電話對談

【簡歷】

鄭傳雙先生，安徽省六安市舒城縣人。1946年6月17日出生於安徽省合肥市肥西縣。1963年3月，與王國芝女士結婚，同年11月應徵入伍，進入濟南軍區26軍77師。1966年5月，由於在部隊中表現出色，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69年，擔任正排職後勤助理員。1977年，擔任副連職後勤助理員。1979年起，擔任正連職後勤助理員，至1982

* 鄭志高，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2020級本科生；電子郵箱：228585919@qq.com；電話：19930150101。

年轉業。1982年2月，擔任安徽省舒城汽車站保衛幹事、安全幹事。1990年起，擔任安徽省舒城汽車站客運主任，至2006年5月18日退休。

鄭傳雙在部隊擔任軍官期間(1969-1982)，主要負責車輛運輸工作和駕駛員管理工作，先後任職於地炮單位、高炮單位。其中，1966-1967年，於山東省惠民地區參加「三支兩軍」工作。1982年從部隊轉業後，先後負責安徽省舒城汽車站車輛運輸安全處理工作(1982-1990)和客運統籌工作(1990-2006)。在此期間(1994-1995)，也曾參與個人承包車輛等經濟活動。作為一名擁有55年黨齡的中共黨員，其個人經歷也深刻地反映了新中國自誕生以來發生的眾多歷史變革。



2021年5月11日，安徽省六安市舒城縣，鄭傳雙應邀在家中接受攝影。图中为郑传双先生。

一、參軍之前(1946年-1963年)——「在上世紀中葉，像我們這些鄉下人，成天只知道閉著眼睛幹活，對未來也不敢有什麼奢望。」



1960年，安徽省合肥市肥西縣，“雙搶”(收早稻，搶插晚稻)運動中，農民在田中勞作。圖片轉載自家鄉網，2011年。網址：<http://www.jiexiangwang.com/cn/ahhefei-feixi.htm>，瀏覽時間：2021年10月30日。

1946年農曆5月18日¹，我出生於安徽省肥西縣柿樹崗鄉²，

- 1 1946年農曆5月18日，即1946年西曆6月17日。由於登記戶口時受訪人並不知道1946年農曆5月18日所對應的西曆日期，因此其各類證件均誤記為1949年西曆5月18日，此後也未經修改。
- 2 肥西縣，今安徽省合肥市轄縣，縣政府駐上派鎮。柿樹崗鄉，今安徽省

祖輩世代務農。五十年代初劃分階級成分時，我家被劃為中農階級，家庭生活起初還算平穩³。

我是家裡的老麼，父母生我時都已年過四十，他們一共生了五個孩子。可到我出生時，家裡卻只剩下三個孩子——我、三姐、二哥。我的二姐在我年幼時便已出嫁，二哥也很早就組建了自己的家庭。至於大哥和大姐，他們在我出生之前便已經過世。聽父母說，大哥年少時便已經是幹活的一把好手，當地的村民都對他贊不絕口。每次村裡的橋面壞了，大哥就會主動扛個鐵鍬趕來，只是輕鬆地填補一下，橋面便修好了。可惜這樣一個能人，後來不知得了什麼病，未滿二十歲便過世了。二姐更可惜，她出生未久便早夭了，父母當時還未來得及給她取名。

所以，打我記事起，就只有我的二哥、三姐和我的父母陪在我身邊。二哥、三姐各自成家後，每天和我打交道的便只有父母了。

可好景不長，在六十年代前後，當地開始鬧「共產風」⁴，有

合肥市肥西縣下轄鄉鎮級行政單位。《中國政區大典》編委會：《中國政區大典2》，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36-640頁。

3 中農階級，一般佔有土地，擁有一部分牲畜和勞動工具，生活來源靠自己勞動。根據中央人民政府《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精神，1950年6月30日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了全國範圍的農村階級成分的劃分。即根據當時中國的土改現狀和需要，將農村階級劃分成了「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雇農」。倪忠文等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手冊》，北京：新華出版社，1989年，第108-109頁；中共瀘西縣黨史研究室編：《中共瀘西縣黨史資料（第2輯）》，昆明：雲南新華出版社，2004年，第120頁。

4 「共產風」，即三年困難時期（1959-1961年）。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

很多農民餓死。1960年，我的父母相繼離世。當時他們還很年輕，都才五十餘歲。可那次饑荒實在是太嚴重了，大家每天只能揀些芋頭藤、花生莖吃，偶爾能吃到飯，但飯裡的雜草和稻殼卻比稻米還多。因此，很多人在這期間都落下了胃病，包括我和我的二哥。1976年，二哥在確診胃癌後去世，年僅47歲。1979年，我也因胃病進行了一次手術。我和二哥可能都是在「共產風」期間埋下了病根。

1960年父母去世時，我才14歲。當時，三姐早已出嫁，我的親人中只有二哥收留我。於是，我便住進二哥家，每天和他一起務農。因為我當時還處於學齡階段，二哥便讓我一邊放牛，一邊上學：週一到週五，我便在學校裡學習功課；週末時，我便回家放牛。在我上五年級時，二哥擔任了生產隊長⁵，家裏的經濟條件略有改善，我便長期在學校裡用功學習，成勳也有了很大提升。直到小學畢業，我才離開學校，重新回到二哥家。

當我再次下田幹活時，我才明白，比起學習，務農是有多麼辛苦！每天清晨，我和二哥剛吃過飯便趕去田裡勞作，到了中午還是忙得不可開交，只能由二嫂趕來送糧食給我們吃。我倆吃完

同，中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國政府網，2008年06月23日。網址：http://www.gov.cn/test/2008-06/23/content_1024934_2.htm，瀏覽時間：2021年10月30日。

5 生產隊長，管理生產大隊或小隊的基層幹部。1958年8月至同年年底，全國74萬個農業合作社合併為2.6萬個人民公社，近99%的農民參與人民公社。原農業合作社則在併入人民公社後稱為生產大隊或生產小隊。1982年，人民公社改為鄉鎮政區單位。徐光春主編：《馬克思主義大辭典》，武漢：崇文書局，2018年，第1017頁。

飯，嘴一抹，便繼續在田裡忙活起來，直到日落時才得以回家歇息。由於農活繁重，再加上一日三餐缺乏營養，已經是青少年的我看起來仍然是又瘦又小的。

不久後，1962年，我已年滿17歲，到了該成家立業的年紀，二哥便準備代我上門提親。那是父母生前幫我訂下的娃娃親。當二哥將此事告訴我時，我並沒什麼反應——既然是父母幫我許下的親事，那自然也差不了。二哥代我提親後不久，那家人便同意了這樁婚事。於是，兩方家長們便一起挑了個黃道吉日，讓我和我未來的太太於1963年3月成婚。

娶妻結婚，這意味著我有了屬於自己的家庭，二哥便和我分了家。此後我才明白，維繫一個家庭是有多麼不易！婚後的第一個月，我太太獨自回娘家⁶省親，家裡的農活便全落在我的身上——我又要犁田，又要耙田⁷，又要栽秧……後來我實在是太累了，便托人催我太太回來，和我一起下田幹活。等她回來和我一起幹活時，我仍然會覺得很累，每天還食不果腹，總之是又累又餓。

終於，1963年秋季，部隊剛好在當地徵兵，我聽聞這一消息便趕去應徵，結果竟然被選上了。得知此事後，我太太並沒什麼意見，二哥也覺得無所謂。二哥只是在我臨行前囑托了一句：

6 娘家，即已婚女子婚前的家，相對於婆家而言。「娘家」，漢典。網址：<https://www.zdic.net/hans/%E5%A8%98%E5%AE%B6>，瀏覽時間：2021年10月31日。

7 耙，一種碎土農具。耙田，即用耙將耕過的土地中的土塊破碎，一方面起熟化土壤作用，更重要的是減少土壤中的大縫隙，減少水分蒸發。夏亨廉等編：《中國農史辭典》，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4年，第311頁。

「到了部隊上，當不當官無所謂，先把身體養好了，以後再回來幹活就是了。」說實話，當時我也是為了混口飯吃才去當兵的。在上世紀中葉，像我們這些鄉下人，成天只知道閉著眼睛幹活，對未來也不敢有什麼奢望。

二、軍旅歲月（1963年-1982年）——「其實我就想著，上級叫我們去，我們就要去，叫我們到哪去，我們就到哪去。要一切行動聽指揮，要吃大苦、耐大勞！」



1970年，山東省煙臺市，鄭傳雙留影紀念。

1963年11月，我正式入伍，隨部隊來到了山東省煙臺市，開始了為期三個月的新兵生活。剛來到部隊時，我真的有一種翻天覆地的感覺——以往在家務農時，我既吃不飽，又穿不暖；進入部隊後，他們不僅發放成套的衣服和鞋襪，還提供足量的米飯

和饅頭。我這個人尤其喜歡吃饅頭，一日三餐都吃饅頭也不覺得膩。那些南方來的兵則口味不同，他們愛吃米飯，但米飯僅中午才會提供，所以我覺得自己比他們幸運多了。

作為新兵，我們還會收到部隊發放的生活費，每人一月六元。要知道，過去務農時，錢是極為少見的。1966年我成爲一名志願兵⁸後，工資更是從六元漲至八元。由於部隊一向提倡簡樸，我個人也沒有抽煙等癖好，所以生活費一直夠用。平日裏除了購買牙膏、肥皂等必需品，我會把剩下的工資存起來，一年能攢五十多元呢！對於這些存款，我有時會寄給家人一些。還記得三姐坐月子時，家裏手頭緊，我便寄了三十元給她，囑咐她多買些補品養身子。

雖然物質條件不錯，可當地的氣候實在是讓人難受——冬季的山東實在是太冷了！我們進行新兵訓練時正值冬季，晚上一個排的人在一間屋裡睡還會感到冷。爲了取暖，下鋪的戰友便會喊我們上鋪的人和他們一起睡，於是我們所有人都擠在下鋪，這樣才會感到暖和些。

除此之外，我們平日的訓練任務也很繁重。我們的班長對新兵的要求極爲嚴格，因此我們每天都是在披星戴月地進行訓練。

8 志願兵，1955年7月3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中國第一部兵役法，規定陸軍義務兵服役期爲3年，3年後繼續留在部隊者則爲志願兵，與軍方簽定服役合同。受訪人鄭傳雙於1963年11月入伍，1966年11月時已滿3年義務兵服役期，轉爲志願兵。《中國的兵役制度（一）》，中國人大網，2010年8月19日。網址：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1231072551/http://www.npc.gov.cn/huiyi/lfzt/byfxzaca/2010-08/19/content_1659939.htm，瀏覽時間：2021年10月30日。

1963年時，新兵訓練的項目主要是打靶和投彈。班長尤其重視投彈這一項目，每次都要求我們將手榴彈投至三四十米以外。當時寒風凜冽，每次訓練後我們的手都凍得十分腫脹。

幸好有戰友們的關照，我才能挺過新兵訓練的三個月。作為新兵連中年紀最小、最爲瘦弱的那個兵，我時常受到戰友們的照顧。剛入伍時，我的老鄉孫成玉便曾塞給我幾張糧票⁹，讓我下館子多吃點肉。日常訓練中，我的班長也很重視我。每次訓練正步走時，他都讓我獨自出列爲其他新兵做示範：他爲我喊口令，讓其他戰友注意觀摩學習。此外，我們排長也對我很好，他是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老兵，帶完我們這批新兵便準備退役了。臨行前，他還特意來到我們班，與我們一起合影留念。

訓練期間，我對自己的表現也很滿意，特別是在解甲莊¹⁰營房¹¹的那件事。那天早晨，我是最先起床的，卻發現營房邊的自

9 糧票，「在計劃經濟時期，糧票是人們的命根子。糧食包括糧食製品，實行憑票供應，沒有糧票，就無法買到糧食及糧食製品。在飯店、食品店等，全部憑票供應，就連參加紅白喜事，也要帶米票。」李三台編：《票證裡的中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1頁。

10 解甲莊街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山東省煙臺市萊山區下轄鄉鎮級行政單位。1958年，建解甲莊人民公社。1984年，改解甲莊鎮，鎮人民政府駐解甲莊村。煙臺市地名委員會詞典編輯室：《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詞典山東分卷：煙臺地名選編》，1986年，第94-95頁；2020年統計用區劃代碼和城鄉劃分代碼：萊山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20年。網址：<http://www.stats.gov.cn/tjsj/tjbz/tjyqhdmhcxhfdm/2020/37/06/370613.html>，瀏覽時間：2021年10月30日；2020年統計用區劃代碼和城鄉劃分代碼：解甲莊街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20年。網址：<http://www.stats.gov.cn/tjsj/tjbz/tjyqhdmhcxhfdm/2020/37/06/13/370613004.html>，瀏覽時間：2021年10月30日。

11 現代營房，與作戰工事完全分離，且功能齊全、設備完善，是專供軍隊

來水管被凍住了，無法供應洗漱用水。爲了找水，以及防止汗濕的鞋襪被凍住，我便脫下鞋襪，獨自跑進山溝找水。後來，我在山溝裡發現一口井，便打了兩桶井水，挑回來給戰友們用。戰友們見狀，都十分感動，也打心眼裏佩服我。

由於我的出色表現，新兵訓練結束後，上級便安排我前往煙臺市區的師直屬教導隊¹²學習駕駛，希望培養我成爲一名駕駛員。我在那裡學習了整整一年的時間，發現學習駕駛竟比新兵訓練更爲辛苦！天濛濛亮，駕駛班的班長便帶我們去上課，由老師爲我們講授理論知識；到了晚上，我們還需要背誦那些內容——例如發電機¹³、電動機¹⁴、起動機¹⁵的工作原理；各類電綫的用途；車軸等零件的作用……這些內容我們都要記誦並通過考核。

待學完理論知識，我們便開始訓練駕駛技能。可就在這時，我們的班長卻被突然調往步兵單位。離開之前，班長還特意囑咐我：「我不在的時候，這個班就交給你負責了。」我當時對班長的日常工作也不甚瞭解，可是這個擔子已經落在了我的肩上，那我便只能硬著頭皮暫時頂上。爲了瞭解駕駛班的日常教學安排，

和平時期生活、訓練和戰備的基地。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編審室：《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北京：中國大百科出版社，2007年。

12 師直屬教導隊，即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第26軍第77師直屬教導隊，當時駐紮煙臺市區。

13 發電機，將其他形式的能源轉化成電能的機械設備。陳裕成等編：《建築機械與設備》，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41-43頁。

14 電動機，將電能轉化成機械能的機械設備。陳裕成等編：《建築機械與設備》，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29-30頁。

15 起動機（俗稱「馬達」），通常由直流電動機、傳動裝置、控制裝置三部分組成。張世軍等編：《汽車電氣設備結構與拆裝》，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19年。

我時常領著班裏的戰友們，像跟屁蟲似的跟在其他班後面。他們做什麼，我們便跟著做什麼。等到新班長上任，我才輕鬆了一些。可是沒過多久，新任的班長也被調離。我們班裡又沒了班長，我便再次挑起了班長的擔子。

終於，1965年，我從駕駛班順利畢業。教導隊則爲我們全體學員召開了一個結業大會，會上還宣佈了上等兵名單。在我印象中，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新兵入選這份名單。很榮幸，我的名字也在其中。也正是在學車的那一年裏，我的身體素質有了明顯提升，僅身高就長了差不多十釐米！

會後，我們便被分配至各個連隊。起初，我被分配至「地炮」¹⁶連，連隊的駕駛班中只有四人，每人負責駕駛一輛軍車。那些軍車中有些是參加過1959年閱兵儀式¹⁷的車輛，就是蘇聯給的「嘎斯六三」¹⁸。這種車輛與我在學車期間的試用車輛相似，所以很容易上手，沒過多久我便正式參與載炮訓練了。一年後，1966年，我被批准回家探親，這是在部隊裏待了近3年的我首次回家探親。

16 「地炮」，地面炮兵部隊的簡稱。「高炮」，高射炮兵部隊的簡稱。炮兵包括地面炮兵和高射炮兵。李豔君等編：《2000個應該知道的軍事常識》，赤峰：內蒙古科學技術出版社，2018年，第140頁。

17 1959年閱兵儀式，即195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周年閱兵儀式。

18 「嘎斯」，中國人對前蘇聯「高爾基」汽車廠生產的汽車的一種稱呼。「嘎斯六三」即GAZ-63軍事卡車。「嘎斯」，百度百科，2021年4月18日。網址：<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8%8E%E6%96%AF/8745593>，：2021年10月30日。



「嘎斯六三」，圖片轉載自網頁搜狐號，2021年7月16日。網址：<http://www.jiaxiangwang.com/cn/ahhefei-feixi.htm>，瀏覽時間：2021年10月30日。

待我再次回到部隊，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影響已經滲入了軍隊之中。我所在的部隊也逐漸將政治學習擺在了主要位置，但軍事訓練等活動仍未廢止。

早在60年代初，軍隊便給全體官兵各發放了一套「毛澤東四卷」¹⁹，之後又增加了一本《毛主席語錄》²⁰，就是「紅寶書」。這些書主要講的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道理。在上級的號召下，我們不僅要背掉這些東西，還要把這種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紮

根心裡，更要將其用於實踐。如果我們記不住這些內容，便不能參評「五好戰士」²¹。由於我在1966年5月便已入黨，所以要在政治學習方面起到表率作用。因此，我在政治學習上很努力，工作也很出色，是學習上的先進分子、工作中的積極分子。1968年，我還榮幸地參加了第26軍黨委擴大會議。



1965年，山東省煙臺市，鄭傳雙與同班戰友合影，圖中每位軍人即手持《毛主席語錄》——“紅寶書”。圖中前排右起第一位為鄭傳雙。

19 毛主席四卷，即《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195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載體，是毛澤東思想的集中展現。何茜：〈「毛著」穿越心靈的紅色收藏〉，《四川日報》2005年12月30日。
20 《毛主席語錄》，又稱《毛澤東語錄》，是毛澤東著作中言論摘錄。毛澤東：《毛主席語錄》，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1965年。

21 五好戰士，即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展的「五好運動」中政治思想好、軍事技術好、三八作風好、完成任務好、鍛煉身體好的戰士，1960年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中提出。曲偉等編：《代漢語新詞詞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4年，第895頁。

1967-1968年，在上級要求下，我們團展開了「三支兩軍」²²活動，我所在的連隊便被調往惠民地區²³參與「支農」工作。由於當地營房不足，我們便在營房周邊自建了幾個平房，以便下鄉進行「支農」——當地農忙時，我們需要和農民們一起幹活。此外，當地的一些治安問題也歸我們管——例如，調查當地有無特務？是否有械鬥等惡性事件發生？我當時被分配至惠民地區的井王大隊²⁴，每天要隨他們的副鄉長一起下鄉視察。到飯點時，我們便在當地百姓家裡吃飯，一般是一天換一戶人家。如果當地要開展學習活動，當地幹部也會邀請我們這些軍人進行指導和發言。

在我看來，開展「三支兩軍」工作主要是為了維護社會治安，重在調查地方上是否存在反動分子：如果沒情況，我們應該少插手地方事務；如果有情況，我們必須馬上向上級彙報。

「支農」期間，我還真遇到過一些反動分子。一天夜裡，有人突然通知我們，井王大隊下轄的某個村子發生了火災，讓我們

趕緊前去救火。等到火被撲滅，我們便著手展開調查，發現起火原因是有人蓄意點火。原來，當晚有人趁著一個老漢正在睡覺時點燃了他的蚊帳，結果造成了火勢的蔓延。雖然案件已經查明，可村中仍然流言不斷，於是上級便派人專門處理此事。而我們這些「消防員」，則在《前衛報》上²⁵作為英雄人物進行刊登表彰。報紙上說，在某某村，當晚幾時，有個老人的家裡被火點著了。前來的戰士們則非常勇敢地把火撲滅。這些戰士們各個都是小英雄！確實如此，救火的時候，我們站在屋頂上一點都不怕，隔壁的人想過來幫忙，我們就讓他們別過來，先保證自己的安全。後來，等我們把火撲滅了，天也黑的差不多了。為防止當晚還有人放火作亂，我們便在那裡歇了一晚。

總體上，山東的農村地區並不亂，省內的幾個大城市也較為穩定。城裡一旦有紅衛兵搗亂，引起了鬥毆事件，當地駐軍便會趕去核實情況。若情況屬實，上級便派一個連或一個團去平息動亂，但這並不意味著軍隊一定會與紅衛兵發生武裝衝突。在文革的環境下，軍隊處理這類問題是很講策略的。例如，煙臺市區中一度有多個派系的紅衛兵鬥毆，各派都有自己的勢力範圍。如果一派去另一派的勢力範圍內鬧事，我們便立刻去「熱烈歡迎」前來的那派紅衛兵，以免兩派之間發生械鬥。所謂「熱烈歡迎」，就是讓士兵們整齊隊形，熱烈鼓掌迎接他們：「熱烈歡迎紅衛兵們來傳經送寶！」這樣一來，那些前來鬧事的紅衛兵就會感到不

22 三支兩軍，「文化大革命」期間，軍隊的支左（支持當時被稱為左派群眾的人們）、支工（支援工業）、支農（支援農業）、軍管（對一些地區、部門和單位實行軍事管制）、軍訓（對學生進行軍事訓練）工作。雨亭，趙金文：〈「文革」中軍隊「三支兩軍」的來龍去脈〉，《黨史博采》2004年第5期，第45-49頁。

23 惠民地區，位於山東省北部。1950年由墾利專區改置惠民專區，轄12縣，專署駐惠民縣。1952年遷駐濱縣北鎮。1956年轄15縣。1958年改稱濰博專區。1961年復名惠民專區。1967年改稱惠民地區。崔乃夫等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大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7801頁。

24 井王大隊，今山東省濱州市沾化區富國街道下轄行政村。「行政區劃」，沾化區人民政府，2021年6月3日。網址：http://www.zhanhua.gov.cn/art/2021/6/3/art_118116_9264735.html，瀏覽時間：2021年10月30日。

25 《前衛報》，1949年3月10日創刊，2016年1月15日停刊，累計出版11114期。〈軍報發文：別了，七大軍區報〉，騰訊新聞，2016年1月22日。網址：https://news.qq.com/a/20160122/042645.htm?qqcom_pgv_from=aio，瀏覽時間：2021年10月30日。

好意思，不久便撤回自己的勢力範圍。

文革期間，我的個人工作也很順利。1969年，地炮連的王汝正指導員²⁶便找我談話，想要提拔我：「現在要讓你挑重擔，你願不願意？」我自然是很開心的，馬上答道：「我願意！」不久，我便從士兵提升為幹部。由於我資歷長、表現好，所以起初便被提拔為正排職的後勤助理員²⁷。1976年文革結束前，我又從地炮部隊轉入高炮部隊。

剛提幹的那段日子裏，我非常興奮，便從前幾年攢的錢中拿出185元，在軍隊內部買了一塊進口的瑞士手錶。雖然那是第三檔次的進口錶，屬於所有檔次中價格最低的那一類，可我覺得那塊錶的品質已經很不錯了：外面的錶殼是鋼制的，裏面的部分零件是金制的。總之，錶的外觀很好看，計時也很準。那塊錶我用了三年有餘，可後來不知為何，錶針就不動了。後來我趁著進市區的機會，便拿著錶請市區的修錶匠查看。他打開錶朝裏看，說是錶內部的機油太厚，把遊絲²⁸纏住了。緊接著，他便擦拭起錶的內部零件。此前我聽說進口錶是不能輕易打開的，不然會影響錶的性能，所以我便準備把這塊錶賣掉，再重新買一塊錶。正巧，修錶匠的周圍便有許多人看錶，我便問他們：「誰要這塊錶啊？」其中有個人便站出來，問我想賣多少錢。我告訴他：「三

26 指導員，政治指導員的簡稱，是連隊和相對於連隊的基層工作單位的政治工作人員，和連長同為全連人員的首長，共同負責全連工作。張潘仕等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思想政治工作知識手冊》，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270頁。

27 後勤助理員，即軍隊後勤部門的辦事員。

28 遊絲，鐘錶內等時運動系統中的彈性元件，呈卷渦狀。夏征農等編：《辭海：工程技術分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7年，第1154頁。

年前我是一百八十五元買的，現在還是出價一百八十五元。」那人聽完便一口答應，因為改革開放前的平常百姓很難買到進口錶。之後，我又取出一些錢買了一隻便宜些的國產錶，結果那塊錶不久便壞了，也沒能賣出去。

逐漸熟悉了我的主要工作後，我才發現，幹部肩上的擔子比士兵重許多，特別是1976年調入高炮營部後。此前在地炮連時，連隊僅配置四輛汽車、四位駕駛員；而高炮營部中，每個連隊有八輛汽車、八位駕駛員。我起初負責連隊內部的車輛運輸工作，後來職權又擴大到全營。當所在營部進行全體訓練時，我要負責帶領車輛搭載高炮，並按時到達指定位置。如果哪個駕駛員吊兒郎當的，不能完成上級安排的任務，我們便會在他服滿三年兵役後將他遣回。此外，各駕駛班的一些小訓練也由我組織。如果訓練中出現問題，不僅整個班會受到連累，就連班級所在的連隊也會受到批評。

除了軍事訓練中的車輛調配工作，我還負責營部駕駛員的日常教學工作。由於這些駕駛員此前的學車經歷各異、駕駛水準不同，我便定期給全營的駕駛員們上課，重點講解化油器²⁹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技巧。當然，現在的汽車大都不再需要化油器了，可它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車輛中還是很重要的部件。

當然，作為幹部，我們還是有些福利的。就工資而言，

29 化油器，又稱汽化器，主要由主供油裝置、輔助供油裝置和附屬裝置等部件組成。化油器主供油裝置的作用是保證汽油機在正常工作時，供給的混合氣濃度隨著節氣門開度的加大而逐漸變稀，並且在除了急速工況和極小負荷工況外的全部工況範圍內都供油。姬慧勇：《工程裝備內燃機》，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2016年，第58頁。

1963-1966年，我還是義務兵的時候，一月的工資是六元。1966-1969年，我成爲了志願兵，工資升爲八元，後來又升爲十五元。而1969年提幹時，我一個月的工資則立刻漲到七十二元，相當於十二個義務兵的月薪總和！後來我回家探親時，二哥便誇我：「夥價³⁰，你一個月掙這麼多錢啊！」作爲幹部，我雖然每月要另交給食堂十四元的伙食費，可我還是覺得工資很多。此外，幹部的體能訓練也少些，我們晚上無需像士兵那樣站崗。在居住環境上，幹部的住宿條件更是有所改善，我們可以單獨住一間屋子，不用像士兵那樣睡上下鋪。就連穿著，幹部也是比士兵好些。以腰帶爲例，幹部的腰帶是皮制的，士兵的腰帶則是帆布制的。



1969年，安徽省肥西縣柿樹崗鄉，鄭傳雙回鄉探親時與其二哥合影留念。圖中，左爲鄭傳餘，右爲鄭傳雙。

30 「夥價」，舒城方言，是一種感歎詞，同「哎呀」。

不過在其他方面，幹部和士兵並無太大區別。在家屬隨軍前，幹部和戰士們平日裡都是一起吃飯，一起參加政治學習，還要一起接受政治考核。對幹部而言，政治考核非常重要，如果某人不能在考核中及格，那就說明他在思想上還存在問題。七十年代時，我們團便每年組織一次幹部政治學習活動，安排幹部們集體駐紮在部隊周邊的村鎮地區，住的屋子有點像窯洞。這類活動通常會持續一周的時間，每天早上由政委召開大會，給我們上三個小時的課，課下我們便自發討論起會上的有關內容。

總的來說，我覺得文革時期的軍隊其實沒什麼變化。我一直在堅持一切行動聽指揮，也一直服從上級的命令。當時，就算是社會亂了，軍隊也不會亂，軍隊依然保持著戰鬥力和警惕性，幹部和士兵的考核任務依然很嚴格。毛主席也反復強調，軍隊就是鋼鐵長城³¹。既然是鋼鐵長城，那我們就是打不爛、拖不垮的。我們始終堅信，上級如何命令，我們便如何做。要一切行動聽指揮，要吃大苦、耐大勞！

就這樣平平淡淡的，到1979年，我預計自己不久後可能要離開部隊了，因爲我在正連職幹部的職位上待了很久，一直沒什麼變動。我心想，差不多到了轉業的時候了。可王汝正教導員³²

31 1967年部分地曾掀起「揪軍內一小撮」鼓噪。此舉被毛澤東制止。時傳毛澤東說：「還我鋼鐵長城。」故有「鋼鐵長城」一詞流行。後解放軍參加「三支兩軍」，「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此語也很常見。雨亭，趙金文：〈「文革」中軍隊「三支兩軍」的來龍去脈〉，《黨史博采》2004年第5期，第47頁；熊忠武主編：《當代中國流行語辭典》，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2年，第193頁。

32 夏征農等編：《辭海：軍事分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7年，第173頁。政治教導員，簡稱「教導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營和相當於營



1979年，山東省煙臺市萊陽市，鄭傳雙與其戰友合影留念。圖中，左起分別為劉恒富、王汝正、鄭傳雙。

依然安慰我：「小鄭，你在這好好幹，只是不能當副營職幹部罷了。但你可以帶家屬，可以讓家屬隨軍³³，這些我們都可以辦的到。」其實我也捨不得離開部隊，捨不得離開這群戰友。像錢景來，孫成玉這些人，我們本就是老鄉，一直都保持著關係；曾經提攜我的幾位班長，也都是與我關係很好的老大哥；至於和我在高炮營部共事的那些戰友，他們與我的交情是最深的。其中，劉恒富是營部的技師；王汝正既是我在地炮單位時的連隊教導員，也是我在高炮單位時的營部教導員……高炮營部中數我們仨共事

的時間最長了。

可到了1982年，我還是離開了部隊。那年2月，我正式從部隊上轉業回到安徽。直到1989年，我才再次回到了煙臺，與幾位戰友見面，之後便再也沒回去過。2017年，住在山東的那

的單位的政治工作人員，和營長同為全營人員的首長，共同負責全營工作，是營黨委員會日常工作的主持者。

33 曲偉等編：《代漢語新詞詞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4年，第811頁。隨軍，即符合條件，經師以上政治機關批准，某些軍隊幹部的直系親屬可隨軍隊生活。1979年，受訪人已在軍隊服役滿15年，符合當時的家屬隨軍條件。



2017年4月16日，山東省淄博市，第七十七師炮兵團三營戰友聚會留影。圖中，第一排左起第三位為王汝正；第二排左起第三位為劉恒富。



1989年，山東省煙臺市蓬萊區，鄭傳雙與戰友東傳銀在蓬萊閣合影。圖中，左為東傳銀，右為鄭傳雙。

幫戰友們還聚過一次，我因為身體不好，路途又太遠，便沒能趕去。

可是，當兵的那十八年歲月，我永遠不會忘記。我是 26 軍³⁴的兵，我是 77 師的兵，這些我永遠都不會忘！對於那些戰友，我也始終想念著他們！如今過年時，我還會給他們打電話，打電話給王教導員，打電話給劉技師，向他們問好。

三、轉業回鄉（1982 年 -2006 年）——「我的性子還是沒怎麼變，上級讓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一開始我是幹事，後來成了客運主任，我還是按部就班地完成分配的工作，一切工作都很平平。」

雖然我是 1982 年正式離開部隊的，但 1981 年時上級已有所指示。其實，像我這樣的老同志，在同一個崗位上工作了太長時間，就應該把位置讓給新同志，部隊可不是供大家養老的地方。所以，1981 年，我抽時間獨自回了一趟安徽，去看看轉業後的工作安排。當時，我很滿意在安排在舒城汽車站的工作。因為在



1989 年，山東省煙臺市，鄭傳雙留影紀念。

那個私家車尚未普及的年代，汽車站是運營不錯、待遇較好的國營企業。又因為舒城縣汽車站所在的城關鎮³⁵，離我的家鄉柿樹崗很近。所以，1982 年 2 月，我便攜家屬一起來舒城。

不過，剛在車站工作時，我還真有些不適應。以前在部隊上擔任幹部時，我只需要負責有關車輛運輸的事務。而到了車站後，我兼任著安全幹事、保衛幹事，要處理的事情十分繁雜。特別作為安全幹事時，一旦車站所屬的客車發生事故，我必須及時趕往現場進行處理和協調。再加上舒城的交通位置重要³⁶，往來

34 26 軍，即原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二十六軍，下轄第 77 師。1985 年，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二十六集團軍。2017 年，調整重組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八十集團軍。「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八十集團軍」，維基百科，2021 年 9 月 28 日。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8%A7%A3%E6%94%BE%E5%86%9B%E9%99%86%E5%86%9B%E7%AC%AC%E5%85%AB%E5%8D%81%E9%9B%86%E5%9B%A2%E5%86%9B>，瀏覽時間：2021 年 10 月 30 日。

35 舒城縣，今安徽省六安市下轄縣，位於安徽省中部，縣人民政府駐城關鎮。楊紀柯等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詞典：安徽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 年，第 340 頁。

36 舒城縣境內，合九鐵路、合安高鐵滬蓉高速穿境而過，105 國道、206 國道、237 國道、346 國道、237 省道、241 省道、330 省道、332 省道、454 省道、603 省道以及四通八達的縣鄉村公路形成便捷的交通網絡。「概述」，舒城縣人民政府，2021 年 5 月 27 日。網址：<http://www.shucheng.gov.cn/mlsc/zjsc/gsp/index.html>，瀏覽時間：2021 年 10 月 31 日。

車輛很多，所以當地發生的交通事故也很多，我幾乎整天忙得團團轉。

相較于軍隊官兵，雖然車站的員工們的工作事務較為雜亂，但他們的紀律卻不是很好。比起紀律，他們更重視工作效率。一般來說，車站員工每日只需要完成當天的工作任務便可以下班了，業餘時間並不會像在軍隊中那樣受控。倘若某天感到身體不適，我們還可以在家請假休息，別人也不會對此說些什麼。

雖然轉業後的工作環境發生了很大改變，但我個人基本上還是堅持往日的作風——上級如何指示，我便如何去做。1990年，我從起初的幹事逐漸升任為客運主任，但依舊堅持按部就班地完成上級分配的工作，工作上十分平淡。

至於家庭上，我覺得也沒有太大變動。自1979年家屬隨軍起，我和我太太的感情逐漸變深，轉業後更是這樣——平日裏兩個孩子都在上學，我和我太太則一起在車站工作，二人有了更多相處的時間。

雖然我個人在工作生活方面變化較少，但國家卻在這一時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就號召大家放手去幹、去闖。可是，一些農民由於怕被扣上資本主義帽子，還是不敢大規模飼養家禽。對此，鄧小平同志便說，要解放思想，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³⁷。在他的鼓勵下，大家逐漸地都敢去闖了，國家的經濟情況也蒸蒸日上。1982年我剛轉業時，一個月的工資只有一百元左右。不久後，月薪便調整至兩百

37 〈歷史學選擇了鄧小平(63)〉，人民網，2018年7月17日。網址：<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717/c69113-30151942.html>，瀏覽時間：2021年10月31日。

多元。可鄧小平同志說，大家的工資還會翻番³⁸。夥價³⁹，我們當時都不敢相信，結果後來真的漲到了七八百元。2006年我臨近退休時，月薪則已經是兩千元了。時至今日，我的退休工資依然再漲！



2000年，安徽省六安市舒城縣，鄭傳雙、王國芝夫婦留影紀念。
圖中，左為王國芝，右為鄭傳雙。

38 〈翻番目標：改革以來歷次黨代會的提法、背景和意義(2)〉，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2016年1月15日。網址：<http://www.dswxyjy.org.cn/n1/2016/0115/c219022-28058876-2.html>，瀏覽時間：2021年10月31日。

39 「夥價」，舒城方言，是一種感歎詞，同「哎呀」。

四、退休生活（2006 年至今）——「總之，現在生活得很舒服！」



2013 年，安徽省六安市舒城縣，鄭傳雙、王國芝夫婦結婚 50 周年留影紀念。圖中，左為王國芝，右為鄭傳雙。

2006 年 5 月 18 日，我正式退休了。此後，我也基本不再主持家事。從 1963 年入伍到 2006 年退休，我已經忙碌了 43 年，實在是累了。在此期間，我也經歷過幾場大病，逐漸明白了身體才是本錢。

其中印象最深的，還是 1979 年那次手術。一天晚上，我在飯後突然開始吐血，被人趕緊送往醫院。當時，主治醫生告訴我，這是胃潰瘍引起的胃出血，目前血止住了，接下來如何做要

看我的個人選擇。我一聽是胃出了問題，便懷疑是「共產風」時期落下的病根，於是請醫生把我胃中潰瘍的部分割除，以免產生後患。醫生徵得我的同意後，便開始準備手術。他先是將我麻醉，之後又問我是否能感覺到疼痛，其實這時他已經劃開了我的肚皮。我當時還能聽到流血的聲音，咕吱咕吱的！哎，幸好醫生處理的及時，當時我才 33 歲，術後的恢復還算較快。如今時隔 42 年，我的胃一直很好。也正是此次手術後不久，上級便批准了我的家屬隨軍申請。

後來，2003 年時，我覺得自己的眼睛有些問題，便抽空獨自去省城合肥的醫院進行檢查。結果醫生告訴我，我的腦子裡長了一個腫瘤，讓我趕緊住院。我說我是一個人來的，什麼東西都沒有準備。醫生便讓我先回家取東西，收拾好了馬上來合肥住院。回到家後，我先是去定制了一張放大的個人照片，準備死了之後留作遺照，之後才把這事告訴家人們。其實，我覺得人死了就是死了，沒什麼大不了的，可家人還是堅持帶我去治療。再次來到合肥後，醫生很快便為我安排了手術。那次手術是微創手術，手術不是特別成功。到 2006 年時，我又覺得身體不大對勁，便再次去合肥檢查，結果發現腦子裡又長了腫瘤，而且比上次的還要大。這次的主治醫生直接為我進行了開顱手術，這才把腦中的腫瘤全部清除。

時到如今，我的身體已經基本無恙。每天早晨，我都是五點半起床，之後便出去散步，待一小時後再回來洗漱。如果我太太做了早餐，我便在家吃點；如果家裏沒有早餐，我便去出去買些吃的。飯後，家裡若有什麼需要我做的事，我便和我太太一起做；如果沒事，我便喜歡獨自出去溜達。總之，現在生活得很舒

服！

至於未來，我也老了，對未來沒什麼打算。在習近平同志的領導下，國家如今也很好：工業、農業等方面都得到了發展，城市也很穩定；反腐工作也在有效推進，一切都很讓人心安。

現在，唯一讓我惦記的便是那塊即將頒發的紀念章——2021年作為中國共產黨成立的一百周年，黨中央準備給我們這些老黨員發頒發「光榮在黨 50 年」紀念章⁴⁰。去年秋天時，舒城縣城關鎮的黨委副書記便親自來慰問我，還交給我五百元的慰問金。當時他得知我符合條件，便答應幫我申請一塊紀念章，我現在還等著呢，哈哈！



鄭傳雙從軍期間獲得的部分獎章。

40 鄭傳雙於196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符合獲得該紀念章的條件。〈「光榮在黨 50 年」紀念章頒發工作正式啓動〉，中國政府網，2021年6月2日。網址：http://www.gov.cn/xinwen/2021-06/02/content_5614960.htm，瀏覽時間：2021年10月31日。



2021年8月9日，安徽省舒城縣，鄭傳雙佩戴“光榮在黨 50 年”紀念章與其孫合影留念。左起依次為長孫鄭裕玲、鄭傳雙、次孫鄭志高。

附：受訪人配偶王國芝女士訪問紀錄



2009年，北京市西長安街，王國芝入住京西賓館並留影紀念。

一、結婚之前（1947年-1963年2月）——「整天都是在找吃的、幹活，哪有時間上學啊！」

我出身貧農階級，打記事起就一直在家幹活。直到1958年，我才開始上學。不久遇上「共產風」，我就沒法上學了——整天都是在找吃的、幹活，哪有時間上學啊！

「共產風」時（1959-1961年），我才十幾歲，可大人們還是給我們這些孩子分派了任務——白天，我們便去割草或是砍柴。到了晚上，我們把收集的草和柴送至食堂，廚師才會給你盛上兩瓢很稀的粥，但這根本沒法填飽肚子⁴¹。於是，在回家的路上，我們便低著頭找吃的。有時找到些荸薺或玉米，我們便立馬將其揣在懷裡，跑回去與家人分享。就這樣，我總算熬過了這段日子，家人們也都在「共產風」期間倖存。

「共產風」結束不久，1962年的一天，我的父母告訴我，他們早已給我安排了娃娃親，而我也快到成婚的年齡了。可是，我自己卻有些抵觸這門親事——當時我先生父母雙亡，家境並不好。同時，周邊的親戚們也都不看好這樁親事，有的人還準備幫我重找個婆家。可我的父親卻始終不同意這樣做。他說，鄭傳雙的父母在生前和我們關係很好，我們不能因為他們已經去世便開

41 1958年8月至同年年底，全國74萬個農業合作社合併為2.6萬個人民公社，近99%的農民參與人民公社。1982年，人民公社改為鄉政權。人民公社的基本特點是「一大二公」。所謂大，就是規模大，將原來一二百戶的合作社合併成為四五千戶乃至一二萬戶的人民公社。一般是一鄉一社。所謂「公」，就是公有化程度高，將幾十上百個經濟條件、貧富水準不同的合作社合併後。一切財產上交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補。在全社範圍內統一核算、統一分配，實行部分的供給制（包括大辦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造成原來的各個生產大隊或小隊之間、社員與社員之間嚴重的平均主義。同時，社員的自留地、家畜、果樹等，也都被收歸社有。人民公社實行政社合一的體制，既是一個生產組織，也是一級政權機構；既要負責全社的農、林、牧、副、漁業生產，也要管理工、農、商、學、兵（民兵）等各方面的工作。人民公社大力推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將勞動力按軍隊編制組成班排連營，採取大兵團作戰的方法，從事工農業生產。徐光春主編：《馬克思主義大辭典》，武漢：崇文書局，2018年，第1017頁。

始反悔。如果悔約，那就是沒有良心、沒有道德！他說：「鄭家再窮都要嫁過去！」這樣一來，我也就不得不斷了另尋婆家的念想。

之後，1962年末，鄭家二哥便來我家提起這樁親事。因為他是獨自來的，所以我和我先生直到此時還未曾謀面。哎，其實我也無所謂了，反正都是聽父母的安排。

二、結婚之初（1963年3月-11月）——「我不是 很喜歡他，也不是不喜歡他，心想就湊合著過 日子吧！」

直到1963年結婚那天，我才第一次見我先生。那時我還小，才17歲，他也小，僅比我大一歲。結婚時，他看起來又瘦又小的，聲音也很細，就像個孩子一樣。我不是很喜歡他，也不是不喜歡他，心想就湊合著過日子吧！

結婚之初，我先生還沒有和他二哥分家。一個月後，他倆才決定正式分家。他們商議時，我剛好在娘家省親，回來後才得知此事。當時，他二哥只分給我們一間小草屋，屋裏連廚房和廁所都沒有，光線條件也很差。此外，屋裏既無桌子，也無椅子，僅有的一張床還是舊的。僅有的新東西，便是那條紅色的棉被。

雖然我和我先生一直勤儉節約，但家庭的經濟情況並未有所好轉。1963年成婚不久，我父母便托我的大姐傳話，讓我們夫妻二人去他們那裏過端午節。這是我倆婚後第一次回娘家，因此我們都想打扮得體面些。可是，我們卻連一件像樣的衣服都沒

有。幸好大姐在來時多帶了一件短袖上衣，我便暫時借用了那件衣服。而我先生則向鄰居借了一件上衣。

由於生活清貧，我倆時常吵架，二人的感情並不算深。正巧，1963秋，部隊來到當地徵兵。我先生便和我說，他想去出去當兵。當時我也無所謂，便默許了此事。後來，他真的通過了部隊的體檢，並回家收拾好行李，同年11月便奔赴山東當兵。

三、獨自在家（1963年10月-1972年）——「當然 孤單啊，我孤單了九年啊！」

直到我先生離家後，我才逐漸明白獨自生活的艱難。從1963年到1972年，我都是在獨自生活。直到1972年長子出生，家裡才逐漸熱鬧起來。

俗話說得好，「每逢佳節倍思親」。在獨自生活的九年裏，我最難熬的便是逢年過節之時。特別是1963年春節時，作為新娘的我竟然獨自過年——當時農村地區普遍認為嫁出去的姑娘不能回娘家過年，所以我不太好意思回我父母家；我先生的二哥二嫂則對我十分冷淡，從未請我去他們家過年。

直到1966年，我先生已在部隊待滿三年時，部隊批准了他回鄉探親的申請，也允許我到部隊看望他。那年，我們大隊的婦女主任也準備去看望在濟南當兵的丈夫，便邀請我和她一起去山東。她對我說：「我們先一起去濟南，你在濟南歇一晚上，第二天再去煙臺找你丈夫。」就這樣，我在濟南歇息一晚後，第二天才來到煙台。由於我不會寫信，來之前並未通知我先生，所以我

起初並未找到他。後來，他的戰友趕來，說我先生正在文登⁴²參與國防建設。這些戰友們很友善。他們先是幫我安排了在部隊招待所的住處，之後便趕去通知我先生。第二天早晨，我先生便駕駛著一輛軍車過來借我，讓我隨他一起去了文登。

其實啊，我是不怎麼想他的！在招待所剛見他時，我吃了一驚。1963年離家時，他很瘦小，還沒變聲。1966年再見面時，他不僅長高了許多，聲音也變得很粗獷，說起話來像打雷一樣「嗚隆嗚隆」的。他的臉上還長了很多粉刺，嚇死人了。

在文登時，由於他白天要參與施工建設，因此我倆共處的時間很少，我在那裡也是閑得慌，待了十幾天便回來了。1966年後，由於他已經是志願兵了，部隊便允許我每年去探望他，也允許他每年回鄉一次。



1969年，安徽省六安市舒城縣桃溪鎮，鄭傳雙回鄉探親。

圖中，左為鄭傳雙，右為王國芝。

42 文登區，今山東省威海市轄區，位於山東省東部，南臨黃海。「文登概況」，威海市文登區人民政府，2021年6月1日。<http://www.wendeng.gov.cn/col/col37151/index.html>，2021年10月31日。

四、攜子在家（1972年-1979年）——「他倆都未到上學的年齡，而且調皮的要命，真是要把我搞瘋了！」

1972年，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是個男孩。那時，我和先生已經結婚九年了。兩年後，我又生下了第二個孩子，又是個男孩。本來我想著，有了孩子，家裡會變得熱鬧些，誰知道哪有這麼簡單！



1976年，山東省煙臺市，王國芝攜二子至部隊探親。

圖中，左起分別為次子鄭霞，王國芝，長子鄭東，鄭傳雙。

1979年隨軍以前，我和兩個孩子都在農村生活。他倆都未到上學的年齡，而且調皮的要命，真是要把我搞瘋了！

白天時，我要下田幹活，等生產隊長吹哨時，我們才能各自解散。每次我在田裡幹活時，他倆就在旁邊瘋玩。兩個人不是沾

了一身泥，就是尿濕了褲子。因此，每天一聽到哨聲，我就趕緊回家，既要忙著洗衣服，又要忙著在自留地上幹活。後來，爲了防止他倆在外面弄髒衣服，我就經常把他倆鎖在家裏。我轉身離開後，他倆就爬到窗子上向外張望。哎，實在是沒辦法！

正是因爲太忙了，所以我一般是跑回家的，別人都說我跑的速度像騎車那樣快。可是不跑不行，我一個人要處理太多事了！

即使忙成那樣，我一個人掙的工分⁴³還是太少了，每年必須從我先生寄的錢裡拿出一些，才能抵得上我們三個人的日常開支。1974-1979年，生產隊一年僅給我們仨分配四兩香油，這怎麼夠吃呢！

除了缺油，家裡還缺木柴。所以，我走路時都是低著頭的，一發現地上有小棍子或乾草，便趕緊把它們撿起來帶回家。後來，我的娘家人前來看望我，問我爲何連柴火都捨不得用，我都不好意思回答他們。

可對這些事，我先生似乎並不在乎，他一直很摳門。但1969年提幹時，他竟然捨得花一百八十多元買手錶。直到1969

43 工分，勞動工分的簡稱，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以前計算成員勞動量和勞動報酬的單位。通常把一個中等勞動力從事一般農活一天完成的勞動量定爲十個勞動工分。十個勞動工分折合一個勞動日。勞動工分原是農業生產互助組組員相互換工時的計工單位，通常按勞動時間計分，如一人勞動一天記十分、半天記五分等。農業生產合作社和農村人民公社中，用它來計算社員參加集體生產的勞動量和勞動報酬。即根據成員完成作業的數量和品質評記勞動工分，並以此作爲分配個人消費品的尺度。有的按時計分，有的按件計分。在實行經濟承包責任制以前，勞動工分也用於手工業生產合作社、街道工廠等城鎮集體經濟組織以及有的國營農業企業。於光遠主編：《經濟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2年，第1004頁。

年他回鄉探親時，我才得知此事。我當時很生氣：「別的男人到了部隊都很顧家，爲了補貼家用，他們還在外面借錢，還因此欠別人的錢。你倒好，雖然不欠錢，但卻一點都不顧家，攢這麼多錢就去買只手錶，只曉得自己享受！」

五、攜子隨軍（1979年-1982年）——「部隊上的工作單純些嘛！」



1979年，山東省煙臺市萊陽市，拍攝此張照片時，王國芝與兩個孩子已隨軍。圖中，左起分別爲王國芝、鄭傳雙。

1979年，我和兩個孩子一起去部隊探望我先生，當時部隊尚未批准我們隨軍。一天晚上，他飯後出去溜達了一會兒，結果剛散步回來便開始吐，最初吐的是小米稀飯，之後就開始大口吐血。我嚇得立馬將他送到衛生室，可血還是止不住。衛生員便趕

緊把他送至部隊醫院，這才止住了血。

去醫院前，他的戰友們讓我留在營部照看孩子。不久，他們便打電話給我，說我先生脫離了危險。聽他們這麼說，我就先安頓好了兩個孩子，之後便準備睡下。突然，營長和王教導員趕來找我，他們敲門問：「小王啊，你睡了嗎？」我說：「還沒哦。」營長便說：「沒的話，我跟你講哦，小鄭現在的情況又不大好哎！」教導員又補充道：「你把兩個孩子交給我家屬，你趕快過去！」聽了這話，我便趕緊隨他們一起去了醫院。剛到醫院時，我看到他正在吐血，而且已經吐了一盆血了。我先生看到我來了，也估計自己快不行了，便把我叫到身邊：「我把手錶留給你吧。」接著，教導員便同我說：「小鄭現在的情況很不好，要準備開刀了。」然而，醫生告訴我們，我先生是O型血，醫院的血庫裡缺少O型血，因此手術時輸血量可能不足。教導員聽到後，趕緊給營部打了通電話，讓幾位O型血的戰士趕往一四五醫院。那些戰士一趕到醫院，便擡起袖子讓護士抽血。幸好有這些小夥子啊！

等O型血抽足了，醫生便立刻開始動手術。起初我先生還沒什麼動靜，後來估計是麻醉藥的藥效減退了，他竟然醒了，兩隻手到處亂抓。醫生見狀便讓我和營部的衛生員抓住他的手，直到手術結束。

此事之後，營部便批准了我和兩個孩子隨軍，並準備幫我安排工作。於是，在他住院靜養的那段日子裏，我一邊照看他和兩個孩子，一邊做些雜活——由於部隊上安排工作需要時間，我便暫時在營部的食堂裏打雜，並去附近的被服廠掙些零錢。

等我先生身體痊癒後，他還是像以前那樣摳門，家裡連根木

柴都捨不得買。我沒辦法，便在工作之餘去營房周邊的田地裏撿麥根。山東人大多種麥子，每年收割麥子後地上還會留有許多麥根，我便把那些麥根收回家當柴火用。後來，部隊為我安排了在被服廠的正式工作，我也就不怎麼撿麥根了。

被服廠的工人大都是女性。工作日時，大部分人一天上班八小時；軍屬則一天上班六小時，上午和下午各提前一小時下班，以便回去給家人做飯。

總之，在部隊生活的那段日子裏，我確實沾了我先生的光，成了一名工人，每月有固定的工資拿。部隊上的工作也很單純，不像離開部隊後那樣繁雜。



1980年，山東省煙臺市萊陽市，鄭傳雙夫婦的兩個孩子合影留念。

圖中，左為鄭東，右為鄭霞。

六、辛勤操勞（1982年-2014年）——「如今回想起來，雖然做生意的日子很忙，不過那時我們有幹勁，一天掙到二十元都覺得很興奮！」



1982年，山東省濟南市，鄭傳雙家屬在離開部隊前留念。

圖中，第一排左起分別為鄭東、鄭霞；

第二排左起分別為鄭傳雙戰友之家屬、王國芝。

1982年，我們一家從山東回到安徽。我先生被安排在舒城汽車站擔任幹事，我則被安排為車站的調度員，直到2002年退休。

每天早上五點半，我們便起床趕去上班，就連冬季也不例外。每輛客車進入車站後，調度員都要去交接路單⁴⁴。接到路單

⁴⁴ 路單，此處指「客運行車路單」。行車路單，指由值班調度員根據計畫調度員事先安排的出車計畫，填寫並簽發給駕駛員執行的行車命令。汽車運輸企業內部一種重要原始記錄，考核駕駛員工作成績，檢車輛使用

後，售票房便開始售票，而持有車票的人則排起隊準備上車。登車前，調度員需要大聲念出乘客的姓名，並為乘客檢票劃號。而最麻煩的則在此後，就是用盡各種方法把乘客塞進客車。改革開放之初，由於舒城客運量大，客車相對不足，所以一輛「大通道」⁴⁵要裝載一百多人。如果有些乘客擠不上車，我們這些調度員便從車門處把他們推上車。若是還有人在車外，我們便讓他們從窗子鑽進車中。待所有乘客都已上車，調度員還要填寫並交接路單，這才完成了一個班次的工作。



圖中為「大通道」。圖片轉載自搜狐號，2020年1月4日。網址：https://www.sohu.com/a/364696749_749431，瀏覽時間：2021年10月30日。

情況，計算燃、潤料消耗和輪胎行駛里程、車輛運用效率指標的重要依據。可分為「客運路單」和「貨運路單」。駕駛員出車前，由調度員將行車路單發給駕駛員，並向駕駛員交待清楚運輸工作中的注意事項。駕駛員完成運輸任務返回車場後，將填好的行車路單交回調度員，由調度員匯總交調度科。鄔惠樂等編：《汽車技術詞典》，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第1489頁。

⁴⁵ 「大通道」，即鉸鏈客車，指由2-3節車廂組成的大客車，每節車廂間有像火車連接車廂的東西。這種客車可以比普通客車多拉幾倍的人。黃劍英主編：《汽車運輸企業技術管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8年，第72-73頁。

由於我小時候讀書少，而填寫路單等工作要求調度員具備基本的讀寫能力，我便讓我先生每天下班後教我識字、寫字。1982年剛擔任調度員的那段日子裏，我先生就像教小學生一樣教我讀寫，我則認真抄寫著他教我的那些字詞，每次抄完後都感到胳膊酸痛。

不過，當時的調度員可是一個風光的職業！由於八九十年代私家車少，因此，當時縣長出差也需要乘坐客車。爲了乘車時坐個好位置，縣長便會時不時地討好我們這些調度員。

八十年代初，我僅做著調度員這一份工作，那時我還並不是特別累。到了八十年代末，我身上的擔子卻突然重了許多。當時，我的兩個孩子已經十幾歲了，有人同我聊天時便談到：「哎呀，你有兩個兒子，以後怕是要花不少錢哎！」我當時心裡也沒底，小聲嘀咕著：「確實啊，以後得花多少錢才能幫兩個兒子搞到媳婦哎？」當晚一回到家，我便同我先生說起此事。他卻一點都不在意，讓我別想那麼多。我急著說道：「養兒子要交差哎！要幫他們娶親畹地⁴⁶哎！」我先生就很反對：「誰說的哎，誰說養兒子就要幫他把什麼事情都搞好哎！」

後來，他實在耐不住我總是說起此事，便準備做點生意，多賺些錢。

起初，我倆打算通過賣早餐賺錢。早上天還沒亮時，我便做好了早餐，留下幾份給家人吃，其餘的都拿出去賣。當時，我們還住在車站對面的白酒廠員工宿舍樓，需要和我先生一起把早餐挑到車站門口。到了車站，我先生便趕去上班，我則獨自在車站

門前賣稀飯和小籠包。因爲我蒸的小籠包特別好吃，所以來買的人總是很多。

當快到我負責的班次時，我便趕緊收拾好早餐鋪，等發車後再回來賣早餐——獨自把一碗一碗的稀飯乘給別人，把一籠一籠包子端給別人，收攤後又要趕回家洗刷碗筷。

2002年從車站退休後，因爲有時要幫忙照看兩個孫子，我便放棄了早餐鋪，轉而在家裡辦旅社，還裝修了一間收費檯球室，供那些年輕人玩。直到2014年，我才放下全部生意，歇了下來。

如今回想起來，雖然做生意的日子很忙，不過那時我們有幹勁，一天掙到二十元都覺得很興奮！可這些生意中，有一次是真讓我後悔——1994-1995年的車輛承包那樁生意，實在是太折磨人了！

此前，我先生作爲國企裡的幹部，是不允許做生意的，只敢平日裏幫我擺早餐鋪。九十年代時，舒城多個行業都流行承包，我倆便想承包一輛車用來拉客，興許還能多賺些錢。誰曾想，承包車輛不僅沒賺錢，還總是出事故賠錢，搞得我整天都很煩！我先生這人膽子小，每次出事故後都很慫，都把事情扔給我處理。我倆一起出去載客，我就完全成了他的「安全幹事」，經常要幫他處理交通事故。

不巧，那一年我們出了很多事故，車的擋風玻璃都碎過三四次，真是倒楣！當時遵守交通規則的人很少，有些人明明沒有被撞，他都要纏著我們不放。

其中有件事，我記得很清楚。那是1994年8月31日，第二天便是學生秋季開學的日子。當天下午，我先生開車把一幫學生

46 「娶親畹地」，舒城方言，指組成家庭，擁有事業。

送至東崗⁴⁷。學生們都下了車，我們便準備開車回家。可就在這時，一個學生突然跑到車前，緊接著車前的擋風玻璃便碎了。我倆見出了事，便想帶著那個孩子附近的醫院。可他的家長卻要我們把孩子送到合肥的醫院。可是，等這孩子在合肥做完體檢後，醫生都認為這孩子並無大礙。但那個家長卻不這麼認為，他堅持說孩子的頭部出了問題，在醫院吵著要我先生賠錢。我先生嚇得躲在一旁，一句話也不敢說。那人便開始罵我先生，說了一大堆難聽的話。我實在是聽不下去了，便和他吵：「人家都四五十歲了，你怎麼能這樣罵人啊！」後來我們得知，那人原來是這孩子的繼父，1994年在上海販西瓜折了本，現在便準備從我們身上補回來。雖然最終沒讓他得逞，可我們承包的車輛還是被公安局扣了起來。

由於車被扣押，直到午夜，我倆才從合肥市區走回東崗。當晚，我先生十分狼狽，在路上還弄丟了一隻鞋。爲了回家，我在路上攔住了一輛大貨車。那輛貨車的駕駛員很和善，答應把我們帶回舒城縣城。可是，貨車駕駛室裡只有一個空位，他便讓我先生坐在敞開的貨艙裏。我見我先生狀態不佳，擔心他的安全，便求那位駕駛員：「師傅啊，他現在頭腦不清醒，坐那裡太危險了。讓他坐在我腿上吧，我們倆坐在一個座位上。」聽我這麼說，那位駕駛員便同意了。當晚回家的路上，我先生便坐在我腿上，我倆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到家中。

不久，1994年農曆臘月二十九日的下午，我們承包的車輛

47 東崗村，今安徽省六安市舒城縣張母橋鎮下轄行政村，地處舒城縣西北。楊紀柯等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詞典：安徽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第340-346頁。

又出了事故。那天，我讓大兒子同他爸一起出去拉客。結果，兩人在上派鎮⁴⁸載客時發生意外。大兒子沒這方面的經驗，我先生又總是畏畏縮縮。因此，我先生便讓大兒子趕緊回家給我報信。得知此事後，我便讓老大先在家待著，自己趕往上派河處理這事。直到晚上，我才把出事的人在醫院裡安頓好了，可那些交警還是不肯放我先生離開。我便求著他們：「你們不讓他走又能怎麼辦呢，他在這留著又沒有用。你們讓他回去吧，明天早上我們再過來。」等我和交警講了好幾遍，他們才肯放我先生回來，那時已經是深夜了。

第二天，也就是大年三十，我和我先生清晨便去公安局處理此事。誰曾想昨晚處理此事的交警已經放假回家了，他把這事轉交給今日值班的交警進行處理，可那個值班的交警不願放我先生走。我便和他吵：「你說這都要過年了，你怎麼能不放人回家啊！這是傳統節日啊，你要讓別人回家過年啊！」見那個交警沒什麼反應，我便偷偷和我先生說：「老頭子，我倆找機會跑！」幸好那是大年三十的早上，公安局內外都沒什麼人，我便和我先生偷偷地溜出來：「老頭子哎，趕快跑，不能給他逮到了，不然我們就走不掉了！」我們當時直接跑到大馬路上，迎面剛好有一輛三輪車經過，我便急忙把它攔住，趕緊拉著我先生竄了上去：「師傅啊，丈個⁴⁹你要開快點哎，誰喊你都別停下，不能停吶！」大年三十的，要是再被那個交警纏住，我們就沒法過年了！

48 上派鎮，今安徽省合肥市肥西縣下轄的一個鄉鎮級行政單位，肥西縣政府駐上派鎮。《中國政區大典》編委會：《中國政區大典2》，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36-640頁。

49 「丈個」，舒城方言，同「現在」。

在舒城出了幾樁事後，我們便跑去合肥拉客，結果還是出了事故——我們的車和一個年輕人的車撞上了。等合肥的交警處理了此事，那個年輕人卻依舊不服，一直纏著我們，不讓我們離開。後來，我先生便讓我先藏起來，待他跑出去再開車接我一起走。我便趕緊找到一扇鐵門躲起來，等他趕來接我，這才躲過了那個年輕人。

有時候，就算沒出什麼事故，交警也會來罰款。有時我就覺得不服，便和交警吵架。從南七⁵⁰到車站⁵¹這一路的交警，我都和他們打過交道，有時交警也被我吵得沒辦法。曾經有個交警就對我說：「下次你們在這拉客的時候，我就當沒看見，行了吧。」

除了工作和生意上的忙碌，兩個兒子也總是不讓我們省心。



特別是老二，一直很調皮，時時刻刻不讓人省心。他小時候經常在外面闖禍，還曾在車站門口和一群年輕人打架。打架時，他還脫去上衣，穿條短褲就直接上。我每次拉

1986年4月，安徽省六安市舒城縣，鄭傳雙一家于舒城縣工人文化宮合影留念。圖中，第一排左起分別為鄭霞、鄭東；第二排左起分別為王國芝、鄭傳雙。

50 南七，即南七街道，今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區下轄街道。「南七街道」，合肥市蜀山區人民政府，2021年7月22日。網址：<http://www.hfss.gov.cn/zqdh/zjyq/nqjdbsc/jdsk/index.html>，2021年10月31日。

51 此處「車站」，指舒城縣汽車站。

也拉不住他，只能摳住他的皮帶，使勁拖住他。我也不是個護短的人，每次他同學的家長找上門來，我也不敢和他們爭論，只能同他們賠禮道歉。

老大雖然老實些，可也幹了一樁蠢事——1988年的一天晚上，老大和他同學一起離家出走了！那晚放學後，我和我先生見老大很晚還沒回來，便去他的同學家找他。等找到他同學李先久家時，他的家長說李先久也沒回來，我便知道他倆肯定是跑了。哎，我當時特別擔心，因為我家老大離家時一分錢都沒帶。李先久因為家裏富裕些，身上還帶了些錢。後來，因為在縣城裏找了很久都沒找到他，我便去跑去求神算命，或是在家裏大哭。我先生見縣城裏找不到他，便動身去了縣城以南的幾個城市尋找。可是他把整個安徽南部都問遍了，還是沒有找到老大。直到隔了半個月左右，上海收容所才來了一通電話，說兩個孩子正在上海。

原來，因為那時候中越關係很緊張，這兩個孩子便心血來潮地跑去雲南參軍，可二人都沒被部隊選上。等他們的錢在雲南花得差不多了，兩人便奔赴上海，後來被上海收容所收留。當收容所的工作人員問他們家庭資訊時，他倆才一五一十地把事情說出來。

1988年時，我們家裡尚未安裝電話，上海收容所便聯係我們單位，單位的人得知此事便趕緊通知我們。得知老大的消息時，我們都開心死啦！我先生立刻趕到了上海，把他倆接了回來。

如今，我們基本已經完成了作為父母的責任，準備安享晚年了，可我先生的身體狀況卻有些不好。

2003年非典時，我先生覺得他右眼有問題，便去合肥進行



1994年，安徽省六安市舒城縣，鄭傳雙、王國芝夫婦合影。

圖中，左為王國芝，右為鄭傳雙。

了一次檢查。等到檢查結果出來，醫生說他的腦部長了一個瘤，讓他住院，準備做手術。後來他回到家，我們便一起收拾行李去了合肥。當時的主治醫生建議他做微創手術，術後讓他記得複查，可我先生沒太在意此事，術後並未去復查。

就這樣，直到2006年，我先生又覺得有些不對勁，這才再次趕往合肥，結果發現腦部仍有腫瘤。這次的主治醫生與上次不同，他建議我先生直接做開顱手術——先把腦顱打開，再把腦中的水瘤切除。術後，醫生說我先生的腦中還有一個黃豆大的水瘤，由於位置太深，便沒有直接切除，而是放了一塊人體海綿吸收水瘤。後來，醫生又用伽馬刀⁵²技術對我先生進行治療，這才除淨了他腦部的腫瘤。

52 伽馬刀 (Gamma Knife)，是立體定向放射外科 (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 的主要治療手段，是根據立體幾何定向原理，將顱內的正常組織或病變組織選擇性地確定為靶點，使用鈷-60產生的伽馬射線進行一次性大劑量地聚焦照射，使之產生局灶性的壞死或功能改變而達到治療疾病的目的。樂革芬等編：《現代外科健康教育：神經外科分冊》，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332-333頁。

七、安享生活(2014年至今)——「至於未來，我們還能想些什麼呢？生死什 的也看淡了，只盼著家裡的晚輩們多來看看，盼著他們未來過得好些……」



2021年5月11日，安徽省六安市舒城縣，鄭傳雙、王國芝夫婦應邀在家中合影。圖中，左為王國芝，右為鄭傳雙。

2014年，我決定不辦旅社了，一是因為車站沒有以前那麼紅火了，過路的乘客變少了，二是因為我也累了。此後，我只是在花園裡留了一塊菜田，種些菜和果樹，自種自吃。

至於我先生，我倆好像沒有很深的感情。從 1963 年結婚至今，我們已經結婚 58 年了，他也不知道怎麼去關心我、討好我，我們也就這麼湊合著過日子。我們年輕時社會上還很少有離婚這一說，不然我早就和他分開了。

現在我們老了，兩個人都閑了下來，也有各自的退休工資，本來是可以好好過日子的。可我們沒有共同語言，我同他講話，他完全和我不在一個頻道上。所以，這麼多年來，我倆就像鄰居之間的那種關係，其實還不如鄰居呢，鄰居們還能在一起聊天。

2017 年，我先生被確診為腦梗⁵³。真是奇怪，他血壓不高，卻患有腦梗，現在幹活都不利索了。他的血糖也偏低，晚上一度在家裡昏死過去，怎樣都叫不醒他——我在他耳邊使勁喊，他才答應一聲，我再喊一次，他又昏過去了。等後來出院後，他總是不願出去活動，整天坐在家裏看電視。有時，我爲了讓他多運動，便經常拖著他和我一起飯後散步。但他並不願意，因爲他走得沒我快，所以我們一般還是各走各的。

總之，以前我們家是最小、最窮的家庭，真的是上無片瓦，只能住在茅草屋裡。忙到現在，兩個兒子也都有了的家庭，我們也總算閑了下來。至於未來，我們還能想些什麼呢？生死什麼的也看淡了，只盼著家裡的晚輩們多來看看，盼著他們未來過得好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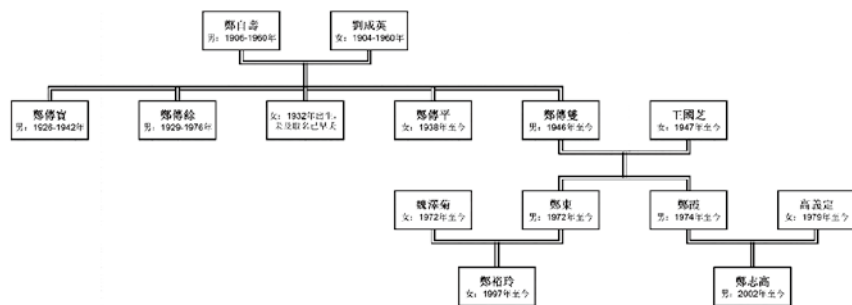


2013 年，安徽省六安市舒城縣，鄭傳雙一家合影留念（參見附一：鄭傳雙家族世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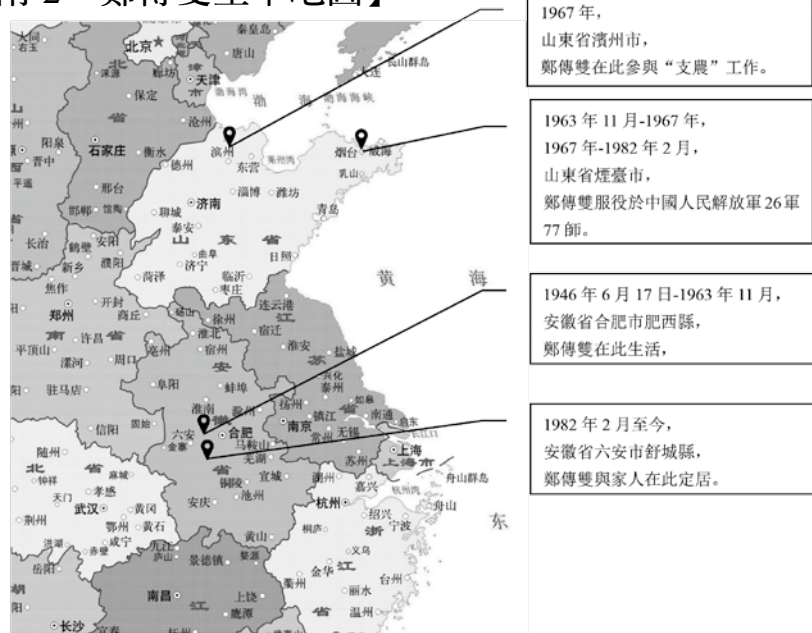
圖中，第一排左起分別爲鄭裕玲、王國芝、鄭傳雙、鄭志高；第二排左起分別爲魏澤菊，鄭東，鄭霞，高義定。

53 腦梗塞，即由於血管阻塞、缺氧或營養缺乏，造成的神經元、神經膠質及血管系統的缺血性壞死或軟化。謝強主編：《臨床醫學影像學》，昆明：雲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20 年，第 489-496 頁。

【附 1：鄭傳雙家族世系】



【附 2：鄭傳雙生平地圖】



底圖轉載自「標準地圖服務系統」。網址：<http://211.159.149.56/download.html?superclassName=%25E4%25B8%25AD%25E5%259B%25BD%25E5%2585%25A8%25E5%259B%25BE>，瀏覽時間：2021年10月30日。

【附 3：鄭傳雙生平年表】

時間	地點	事件
1946年6月17日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縣	出生。
1947年8月3日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縣	配偶王國芝出生。
1956年5月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縣	年滿十歲。
1960年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縣	父母相繼去世。
1961年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縣	小學畢業。
1962年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縣	二哥鄭傳餘前往王國芝家提親。
1963年2月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縣	與王國芝結婚。
1963年10月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縣	應徵入伍，進入26軍77師。
1963年11月-1964年1月	山東省煙臺市	接受新兵訓練。
1964年2-12月	山東省煙臺市	進入77師直屬教導隊學習駕駛，並升為上等兵。
1965年	山東省煙臺市	分配進入地炮部隊，擔任駕駛員。
1966年 1966年5月	山東省煙臺市 山東省威海市文登區 (時屬山東省煙臺市)	成為志願兵； 參與國防工程建設； 配偶王國芝首次前往部隊探親； 加入中國共產黨； 年滿二十歲。
1967年	山東省煙臺市 山東省濱州市	開始學習「紅寶書」； 參與「支農」工作。

1968年	山東省煙臺市	結束「支農」工作； 參加第26軍黨委擴大會議。
1969年	山東省煙臺市	擔任正排職後勤助理員； 使用185元購買一隻進口瑞士手錶。
1972年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縣	長子鄭東出生。
1974年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縣	次子鄭霞出生。
1976年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縣	二哥鄭傳餘去世； 年滿三十歲； 調往高炮部隊。
1976年5月	山東省煙臺市	
1977年	山東省煙臺市	擔任副連職後勤助理員。
1979年	山東省煙臺市	因胃出血進行手術； 擔任正連職後勤助理員； 家屬正式隨軍。
1980年	山東省煙臺市	因鼻中隔彎曲進行手術。
1981年	安徽省六安市舒城縣	接受轉業工作安排。
1982年2月	安徽省六安市舒城縣	正式從部隊轉業至安徽省舒城汽車站，擔任保衛幹事、安全幹事。
1986年	安徽省六安市舒城縣	年滿四十歲。

1988年	安徽省六安市舒城縣	長子鄭東離家出走， 同年找到。
1990年	安徽省六安市舒城縣	轉任安徽省舒城汽車站客運主任。
1994-1995年	安徽省六安市舒城縣	開始個人承包車輛。
1998年	安徽省六安市舒城縣	放棄承包車輛。
1996年	安徽省六安市舒城縣	年滿五十歲。
1997年	安徽省六安市舒城縣	孫女鄭裕玲出生。
2002年	安徽省六安市舒城縣	孫子鄭志高出生。
2003年	安徽省合肥市	進行腫瘤切除微創手術。
2006年3-4月	安徽省合肥市	再次進行腫瘤切除手術；
2006年5月18日	安徽省六安市舒城縣	年滿六十歲； 從安徽省舒城汽車站退休。
2016年5月	安徽省六安市舒城縣	年滿七十歲；
2016年11月		因腦梗接受治療。

【附 4：訪問後記】

一直以來，我都為自己出生于軍人家庭感到榮耀。而這個參軍的光榮傳統正是從我的爺爺鄭傳雙先生開始的，如今到我這一代中斷，我感到十分遺憾與慚愧。所以，在此我想坦誠，這次對爺爺進行的口述訪談確實是以記錄家族歷史的目的為原動力的。可是，對口述史研究乃至整個歷史研究的思考同樣是在前方吸引我堅持進行這項口述訪談計畫的強大引力——受訪人說的是什麼？受訪人為什麼會這麼說？受訪人的內心想法與其口述之間又存在著何種差異？在口述訪談的過程中，我逐步向受訪人的內心深處探索，思考著那些語言背後更深層次的語境（context）。

為了更全面地認識受訪人鄭傳雙先生，也為了更全面地理解受訪人口述的內容，我經常將一些受訪人已經回答過的問題向受訪人妻子進行再次提問，以期進一步驗證受訪人的話語，或是對比二者口述內容的異同，從而探索這些「表象」背後的「真相」，同時思考著口述史與人性之間的關係。

在這些訪問記錄中，鄭傳雙先生的口述內容與其配偶王國芝女士的口述內容大多吻合，但二者在關於一些人和事的評價上仍有不小的差異。然而，由於人性是複雜的，我們終究無法洞悉這兩位受訪人的內心世界，也很難對這些話語的真實性進行查證，更是無法從這些關於人的評價中進行取捨。那麼，這些口述內容的意義又在於何處呢？筆者認為，對此，我們不放換一個角度，暫時拋開所謂「絕對理性」與「絕對客觀」的束縛，回歸到自然的人性思考之中。作為主訪人，我們永遠無法絕對客觀理性地看待一切。作為受訪人，我們更是無法絕對客觀理性地「說」出一

切。試想一下，當主訪人拋卻置身事外的立場，開始在思想上主動貼近受訪人及其口述內容時，我們或許更能與受訪人共同進入一種和諧的狀態，並與之產生共鳴，形成內心之間的雙向交流。而筆者正是嘗試從二位受訪者各自的立場上看待對方，既希望呈現出二人口述內容的差異，也希望採用一種「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的態度包容這些看似矛盾之處，從而尊重兩位受訪人及其口述內容。

具體而言，從這些口述訪談記錄中可見，二位受訪者都可謂是經歷過坎坷曲折的人生歷程。這些經歷既平凡，卻又不凡。一方面，他們只是億萬中國人中的滄海一粟，與同時代的眾多國人一起從歷史的浪潮中走向未來；另一方面，在相同的時代背景下，每個人的人生經歷卻又不盡相同，並在不同的人生經歷中折射出不同的人性、不同的人格魅力。因此，年輕的我們雖然永遠無法體味兩位受訪人當年的的人生經歷，但至少可以努力從他們的口述中摸索出那段歷史的輪廓，從他們對那段歷史的認知中去感受那些人、那些事以及那些人和事背後的人性魅力。